

1. 时教授开篇提出朝鲜为何如此坚决地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是朝鲜“推崇安全”吗？相反，他认为真正的首要原因在于朝鲜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正如中国多年来向朝鲜指出的一样，核武器不会改善其外部环境。既然中国实际在法律和道义上不得不保护一个无核的朝鲜免遭无端攻击，因此朝鲜为对外安全原因实际上不需要核武器。在现实中，核计划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朝鲜的政治文化。朝鲜的生活条件如此之差，以致于政府必须能够提出象征朝鲜伟大的某种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核计划对朝鲜领导层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愿提出真正的经济改革前景，而且越来越固守于“军事第一”的思想。所以在朝鲜看来，核计划是金正日留下的核心遗产，不能遗弃。此外，朝鲜的政治文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大幅退步：20世纪6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日益成为族裔主义者和朝代世袭者。
2. 自1967年以来，美国对以色列一直是无条件履行承诺，有时甚至还无法掌控这位盟友。但美以关系要比中朝关系好很多，两者是不同的：关键区别在于缺乏相互尊重。金正日对中国的态度往往以不友好为特征，而在金正日看来，中国没有表现得像一位盟友。美国总是会在联合国否决反以色列的决议。因此尽管存在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美以关系与中朝关系的区别显而易见。
3. 从历史上看，中国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如何以和平方式使朝鲜实现无核化，另一方面是如何同时保持基本的友好关系和帮助维护朝鲜国内的稳定？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从2003年至2009年，中国的优先考虑事项是与美国合作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但是，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如果给朝鲜施加过多的压力，双边关系就会蒙受损失，而中国也会失去其对朝鲜的影响力。采取“强硬”立场无法对朝鲜造成影响，但“柔性”立场也无法取得成功。中国为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付出努力：首要考虑应当是无核化还是一个可以维持运转的朝鲜？自2007年以来，中国和韩国已经基本被排斥在美国和朝鲜进行的无核化谈判之外。
4. 然后，自2009年秋季以来，在充分了解了金正日的真正健康状况以及其继承人的脆弱性后，中国改变了对朝政策。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和政治援助，甚至为稳定金正恩继承权位提供帮助。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绥靖政策”，它也分为几个阶段。金正日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自2009年直至他去世之前，他至少为推动中朝双边关系回暖付出了重大的努力（尽管曾经有过“艰难的时刻”，包括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
5. 然而，金正恩从一开始就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明确的不友好的政策（注意：时教授也认为，金敬姬的丈夫张成泽对金正恩的影响有些言过其实，从本质上说可能不如同样有“白头山血统”的金敬姬对其影响大）。朝鲜对于任何重要事态的发展都没有提前告知中国，其中包括金正日去世、闰日协议以及发射火箭等。因此，自金正日去世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从最初的期望，逐步发展成为失望，甚至愤怒。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发射大推力火箭发表的措辞强烈的主席声明就反映出了这种愤怒，让时教授以及许多中外其他评论家都感到惊讶。

6. 但是中国所处的两难境地依然存在：中国可以期望的最好事情是朝鲜多一些和平，多一些改革。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哲学大不相同。西方学者认为，总会找到说服朝鲜的“一个答案”和一种解决方式。相比之下，中国自 2005 年以来的做法，则是通过经济刺激因素，希望逐步鼓励朝鲜进行改革。目前，还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行方法，但历史将会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这将是不可预知的。国际社会指责中国使朝鲜问题陷入僵局，这种指责是错误的。中国的政策失败了，但这不足为奇。美国的政策也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过，韩国的“阳光政策”和“大谈判政策”等亦是如此。朝鲜政治文化的独特性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但中国民间经济跨境影响力的逐渐增加则会产生一种良性的“蚀变”效果。从长远来看，中国可以发挥的最大影响力，可能不是来自政府的政策，而是来自穿越边境的、草根阶层的中国人的集体影响力。
7. 关于朝鲜的未来，似乎是要继续沿着一条危险的道路走下去——朝鲜已对韩国李明博政府发出多次严重威胁。此外，朝鲜还修订宪法，自称为有核国家——即使金正日也从未走到这种地步。金正日永远不会在刚刚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后就迅速将之打破，也不会如此糟糕地错误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更不会邀请全球媒体来观看表现拙劣的卫星发射。所有这些错误表明，金正恩与其核心亲属大概远不如金正日可靠和富有经验——中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